

以「安全場域」概念因應親密暴力案件危機

吳啟安

壹、前言

「親密暴力」是性別暴力議題中重要的一部分。親密關係指配偶、前配偶及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者。親密暴力則是指具有前開親密關係的兩個人間，發生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口語虐待、精神虐待及性虐待）、騷擾及跟蹤，造成身體或精神上的創傷等情況。親密伴侶間的暴力，對被害人而言不僅是身體上的傷害，更造成心靈上的嚴重創傷。二個彼此具有親密需求的人，在共同生活過程中，一方使用暴力，進而權控另一個較為弱勢的人。面對此類案件，因兩人的關係緊密，致使外部介入力量更是難以協助，同時亦基於人性對愛、歸屬感等親密關係的需求（Maslow,1943），往往受暴的一方也常無法輕易離開此一受暴環境當中，而使得暴力情況更加惡化。

我國親密暴力的相關法令規範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中。依據該法所定，家庭暴力意指家庭成員間（包含配偶、前配偶、現有及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間關係、現有或曾有直系血親或姻親及現為或曾為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姻親）之身體上或精神上之不法

侵害。

根據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家防會）統計資料顯示，家庭暴力案件自 2010 年起，全國每年通報案量均達 10 萬件以上，而當中二人關係為：配偶、前配偶、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及現有事實上之夫妻關係等之親密關係間的暴力，自 2010 年起每年均達 5 萬件以上，占全般家暴通報案件中的一半（如表 1-1）。

表 1-1 全國家庭暴力通報案件兩造關係一覽表

全國家庭暴力案件通報二人關係一覽表					
年度	總通報數	親密關係		非親密關係	
2010 年	105130	53397	50.7%	51733	49.2%
2011 年	104315	50673	48.5%	53642	51.4%
2012 年	115203	54878	47.6%	60325	52.3%
合計	324648	158948	48.9%	165700	51%

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家防會網頁。

同時依據家防會資料顯示，全般家暴案件近三年來，受暴為女性案件數分為 74,115 人（2010 年）、68,585（2011 年）及 69,543 人（2012 年），合計有 212,243 人次，占 65.3%。

顯示女性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受暴人數仍較男性為多。

親密暴力案件的發生，「情境」因素極為重要。親密伴侶平日生活空間的互動性、重疊性極高，二人依賴極深，且於共同生活環境之中。加上暴力發生時，大部分時間亦為二人獨處，若有第三人在場，通常就是家人，家人中又有極高比率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子女。因此對於暴力行為的即時抑制，有其困難。因此所造成傷害極大。

近年來對於婦幼保護意識的整體提升，對於家庭暴力案件的防治，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員投入許多心力，研提許多預防策略，包含對於加害人個人病態因素、家庭病理、社會影響、法令規範與處遇策略等進行許多研究。但吾人可以發現，除了著手施暴一方的個人病理與外部環境因素的探究外，就親密暴力案件的加害與被害生活互動特性而言，「場域」是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試著從「安全場域」的觀點，進行討論並提出防治之建議。

貳、以「安全場域」因素討論親密暴力案件

親密暴力案件的發生成因多樣，就此議題已發展出許多理論加以解釋。例如從個人的生理、心理層面、人格特質、性別刻板印象、社會學習、不當接觸、系統觀念等，均是從加害人的暴力權控部分加以討論。但若加上「場域」因素加以探究，實可發現，親密暴力與其他犯罪最大不同特性就在於「場域」因素。

「場域」包含空間中相處互動之行為、個體，及平日所處的時空，與二人互動的過程。就親密暴力案件而言，處於親密關係的二人，平日活動的場域重疊性極高，且此一場域與公共社區極具阻絕性、封閉性與私密性。因此，從犯罪被害角度檢視，兩人親密獨處的場域與高度危險場域，僅是一線之隔。同時，此一「場域」的外部監控力量薄弱，介入不易，兩人關係中強勢的一方施展權控作為極為容易，若親密愛人轉變成施暴的一方，就犯罪的情境而言是極為適合的。因此，親密關係中的「安全場域」建構，極為重要。包含不使用暴力的承諾、安全空間的營造、病態因子與誘發暴力因素的排除、被害人對於受暴風險的敏感、暴行當時的緊急處置方案的預擬…等，都關係著是否能建構所謂的「安全場域」。

若將親密暴力從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角度出發，並界定為犯罪行為，同時結合「場域」的概念加以討論。學者辛德廉（Hindelang, 1978）提出「生活方式曝露」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的出現必須具備 1.加害人與被害人應同處於同一時空。2.兩人必須有所爭執或對抗。3.加害者必須有企圖並有能力犯罪。4.情境必須有利於犯罪。而柯恩（Cohen, 1979）則提出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犯罪有三項因素，包含 1.有犯罪動機的犯罪人、2.潛在的被害人、3.監控的力量不存在。當此三項因素俱備，犯罪發生。（轉引自楊士隆、蔡德輝，2012；許春金，2006）此二理論均從個人平日的生活方式加以探討，檢視該二理論發現，與親密暴力案件發生的特性高度相符。就親密暴力而言，加害人須與被害人

同處於一個時空中，才有犯罪的機會。二人獨處過程中，外部監控力量不足，介入困難。若有意實施犯罪之加害人，實有較多得手機會。加上二人平日生活方式、人際互動極為密集，此一「情境」實有利於犯罪；同時親密伴侶平日共同生活，且「家」是個人的堡壘，但家庭內的情境，卻是有利於家庭暴力案件的發生。

此外，學者 David Finkelhor (1996) 亦認為，犯罪案件為重復被害的情形具有 1.被害者的弱點因素、2.攻擊被害人可以得到滿足因素、3.攻擊被害人可以抒解憎惡因素等三項原因（引自許春金，2006；楊士隆、蔡德輝，2012）。就實務工作而言，性別暴力案件中，「弱點」因素極具關鍵。女性體能先天較男性為弱，男性對女性施予體能強制的犯罪，較為容易，是以吾人可以發現，親密暴力的受害者以女性為多。另一方面，當人際關係愈加緊密、且一方弱點因素愈高，則重復受害的情況愈容易出現。此一模式更可說明親密伴侶間弱勢一方受暴期間極長，且反復受害的暴力循環情境，更易使受暴一方的內心產生對於「愛」與「暴力」感受的混淆。

參、親密暴力案件危機管控的討論

親密暴力案件的介入核心主要在於「致命危機」的避免，這也是家防會自 2011 年起全面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最重要的目的。對於家庭暴力案件的緊急危險事由，透過各個公私部門的協力合作，一同投入力量展開防護，有效保護受害者的安全。在安全防護網方案中，「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

是整體方案的運作核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家庭暴力防治單位，如社政、衛政、警政、教育、勞政、司法及民間協力單位，每月就轄內家暴事件的「高危機」個案，共同研商討論，檢視相關危機因子，並採取必要介入之手段，以有效降低致命事件的發生。

「高危機」意指對於生命安全有重大影響之情境，因此高危機因子的判別是首要克服的挑戰。就高危機個案的開案評估，主要有三種方式，分為「工具評估」、「事件評估」及「專業評估」。學者林明傑、沈勝昂（2003）、王珮玲（2009）等根據家暴案件特性，發展危機評估工具，提供給實務單位人員運用。於受理案件時，以評估量表提供予被害人填答，據以分辨危險程度，此為「工具評估」。若被害人受暴情況相當嚴重，由社政單位或警政單位服務人員依職權聲請「緊急保護令」時，此一個案亦為高危機個案，此為「事件評估」。另部分個案對於工具評估的分數偏低，同時亦未符合聲請緊急保護令之案件，但經第一線實務人員依據個人從事家庭暴力防治之專業素養，就案件整體危險情況進行考量，認為具高度危機，此時實務人員亦可主動提報會議開案列管，此種評估方式則為「專業評估」。

案件經由評估為「高危機」後，即開始於網絡會議中進行討論。網絡會議時由直接介入服務人員就對於個案的觀察所見提出簡報，主要為社政、警政、衛政及教育人員，若另有其他專業單位人員就本個案直接服務，亦邀請共同參與會議。會議中由與會人員逐一就個案進行討論，之後並就危險因子標定與介入策略形成共識，繼續各項服務執

行，並於次月檢視執行成效。若致命危險程度降低，案件則解除列管，回歸一般各自專業在家庭暴力問題之服務。

茲以雲林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所開案列管之高危機案件為例進行分析。自 2011 年至 2012 年所開案列管之高危機個案，經討論後解除列管的個案計有 207 案，其中非親密伴侶者計有 26 案，親密關係有 181 案。親密暴力關係中的 181 案中，男性被害人有 4 人，女性受害人為 177 人，其中包含陸籍配偶 8 人、越南籍 5 人、印尼與柬埔寨籍各 1 人。

開案列管之個案每月討論一次，檢視這三年間討論達 5 個月(含)以上者計有 34 案。將該 34 個案所具備之高危機情況之個案的危險因素（每一個案不僅一項）加以整理，相關危險因素如表 3-1。

表 3-1 雲林縣 2011 年-2012 年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列管 5 個月以上個案之危險因素一覽表

項目	次數分配	
酒精使用	15	23.4%
精神障礙、情緒障礙且未能接受治療或規律服藥	14	21.8%
持續不斷之騷擾行為	5	7.8%
無法正常工作，常因金錢問題爭吵	5	7.8%
疑似持續使用毒品	4	6.2%
違反保護令之行為	4	6.2%
離婚條件談判中	4	4.9%
對子女不當管教、怒罵或遷怒子女	3	4.9%

項目	次數分配	
放火燒毀被害人動產、駕車衝撞被害人營生之麵攤	3	4.9%
加暴行於他人之行為	2	3.1%
雙方持續之嚴重衝突（口語、肢體）	2	3.1%
加害人權控意識強	1	1.5%
對被害人強迫施予性虐待	1	1.5%
被害人無聲請保護令	1	1.5%
合計	64	

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學者邱獻輝（2012）就違反保護令罪入監服刑的男性家暴加害人進行訪談，提出以華人文化觀點檢視，男性家暴加害人有 8 個主題概念與其暴力有關，包含「（懷疑）出軌、子女監護、妻子未盡家務、對保護令的反擊、酒精使用、金錢與經費使用、讓先生丟臉、憂鬱或精神疾病及衝動性等的臨床問題」，認為此 8 個概念都易使華人男性對親密伴侶施暴情況增加。雲林縣列管之高危機個之危險情境與此一分析結果比對，高度相符。

對於可能發生致命危機的家暴案件而言，雲林縣的網絡會議成員，就其專業的判斷認為「酒精使用」與「精神障礙、情緒障礙且未能接受治療或規律服藥」的加害人最具危險性。意即，加害人持續飲酒，或有酒癮，還是加害人有情緒或精神上的困擾未能接受治療，這對於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具有高度威脅，使得網絡人員無法放心輕易解除列管。此外，其他各種危險因素，事實上也易

造成被害人的致命風險，亦應加以注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表 3-1 所列管達 5 個月以上的個案危險因素，雖僅有 64 個個案，但這些危機因素已可涵括其他列管 4 個月以下的 117 件親密暴力高危機個案的危險因素。

高危機個案開案列管後，每月就相關情況進行討論，若認危機解除，案件則解除列管，回復由各專業單位依職責規定進行服務。就解除列管指標分析（每個案件解除列管的指標均有一個以上），相關指標如表 3-2

表 3-2 雲林縣 2011 年-2012 年高危機網絡會議解除列管指標一覽表

分類	項目	次數分配	
被害人	被害人安全能量增加(安全計畫、家人朋友協助)	14	4.9%
	被害人可以避免(口語、行爲)刺激加害人施暴之行爲	5	1.7%
加害人	行爲模式確實正向改變	20	7.1%
	接受處遇、酒癮治療、住院治療、精神情緒障礙規律服藥	25	8.8%
	病態因子減低：酒精使用減少	23	8.1%
	穩定工作，經濟改善	18	6.4%
	身體能量降低：重病、重傷、死亡	14	4.9%
	入監服刑	14	4.9%
兩人互動	分居：暫時分開與搬離現址	55	19.5%
	暴力減低無激烈衝突	24	8.5%
	離婚	17	6%
外部監督	法律威嚇具有效果：保護令核發、警察約制、拘捕	52	18.5%
合計		281	

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如前所提及，親密暴力最大的挑戰在於「場域」因素。二人相處的場域必需建構在安全的基礎上，方能有效避免暴力行為的發生。綜合以上對於家暴高危機網絡會議的列管個案分析資料顯示，針對親密暴力的即時危機部分，酒精使用、精神與情緒障礙未能就醫、持續的騷擾、無法正常工作，常因金錢爭吵、疑似使用毒品、有違反保護令之行為、離婚條件談判過程中、對子女不當管教、以非法手段破壞被害人之動產、對他人施暴、持續之嚴重衝突（口語、肢體）、對被害人的權控意識強烈、強迫性行為及被害人無聲請保護令之意願等，都會是造成親密暴力事件中致命機會的增加，致命危險性升高。

相對於危險指標，經由分析比對亦可發展出安全指標，成為建構安全場域的參考。安全場域概念的建構，可區分為四個因素，分別為「被害人」、「加害人」、「兩人互動」及「外部監督」等四個部分。

「被害人」對於親密關係中暴力的認知應符合社會價值，並且對於暴力零容忍。同時依據前開分析資料顯示，若被害人本身安全意識能夠強化，具備建構周延的安全計畫能力，同時可以減少刺激源（刺激加害人動手、施以虐待），能夠自主躲避危險，並能得到家人朋友的有力支持與協助，安全情況得以提高。

「加害人」部分，綜合前開分析資料顯示，若其能習得正確行為互動模式、暴力行為能夠有效改變，本身情緒與精神困擾因素能積極治療、生活環境中減少酒精使用、穩定投入工作，甚至是加害人本身身體能量降低（如重病、重傷）等，這些因素亦可避免

伴侶的致命危機。

就「兩人互動」的時空因素討論，吾人可以發現，客觀生活空間上的迴避，如二人分居，包含暫時性分開如進住庇護中心、返回娘家，甚至是直接搬離現住地，或是加害人入監被隔離，最能有效避免致命危機的出現。

最後「外部監督」的監控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反暴力的倡議宣導、法律有效執法（民事保護令、刑事保護令等）、警政單位強力約制。這些都是有效避避免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外部重要因素。

肆、防治親密暴力案件的具體建議

親密暴力案件多從個人生理、病理因素與人格特質等層面加以探討，但若將親密暴力視為一種「犯罪行為」，並從「場域」概念出發，可試著結合犯罪學領域中的「情境犯罪預防」概念，強化建構自我保護能量，避免致命危險出現。情境預防的核心概念包含：對隱性的加害人提高犯罪成本、增加實施犯罪的風險、降低犯罪衝動的誘因、減少對於犯罪的刺激、移除犯罪的藉口等因素加以著手，建構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Clarke, 1997，引自許春金，2006；楊士隆、蔡德輝，2012）。學者 Siegel（2009）更認為情境犯罪的三大主要議題分別是：潛在犯罪被害者能被保護、犯罪方法與手段能被控制、潛在犯罪人能被監控。結合上述學者就情境犯罪預防論述與網絡會議運作實務工作所見，針對親密暴力提出防治建議如下：

一、生活安全空間的建構

對於親密暴力問題生活安全空間建構，吾人可從個人空間、家庭空間及社區空間等三個方向加以思考：

（一）個人生活空間

個人生活空間的部分包含內在自我安全認知與因應外部攻擊之安全計畫。個人自我在安全上的認知應有最低限度。夫妻（親密伴侶）二人生活相處難免有意見不一之情況，面對此種生活意見衝突應能具備正向成熟且合宜的討論態度，且承諾不得以暴力脅迫相向為最低限度。只要有一次的暴行，無論輕重，未來產生重大暴力情況的機率大幅提升。親密伴侶平日互動時間極長，這是對於親密暴力問題介入的困難點之一，但是，此一問題去也是個人在互動安全上的優勢。對於親密伴侶的行為模式、生活習性、情緒與精神狀況，能有較多的接觸。是以對於潛在引發暴行的刺激點，可比其他人更加瞭解，因此衝突時應避免過度刺激加害人，能有效降低暴行發生。

經由前開對於危機個案的分析可以發現，當二人衝突情況日益激烈並已有危及人身安全之虞時，居於弱點因素較高的一方易成為被害人。此時強化本身安全維護能量、避免更進一步刺激相對人，保持客觀上身體距離等，都可以有效避免更嚴重的致命危險出現。如接受庇護、返回娘家或暫住親友家，都可以是緩衝暴行，使其冷靜下來，並思考重新面對的策略。惟若加害一方情緒嚴重失控，此時更需思考保護令的使用，以提供緊急時刻時，警察人員可以據以依法報請檢察官

拘束其自由，以防止更嚴重的暴力行為出現。

(二) 家庭的安全空間

家庭包含二人世界及與其他家人同住之情況。在二人同住的情況中，危險促進物的有效排除或合理使用是必要的認知，例如「酒精」一直是親密暴力案件影響極大的物質，酒精會使控制能力減低，增加暴力情況的發生。（沈慶鴻、郭豐榮，2005；林明傑、沈勝昂，2003；王樂民，2011），甚至發生親密伴侶二人酒後互相施暴的情形（Busch A.L.& Rosenberg M.S.，2004）。基於此一理由，家庭中的酒精使用更需特別謹慎，對此類易誘發暴力發生的物質，使用上更需特別當心。另在之前的分析提到，「情緒與精神障礙且無意治療」亦是一項高度危險指標，是以親密伴侶若有此種情況，務必鼓勵其前往治療按時服藥接受治療，避免發生憾事。此外若施暴的一方持續有違反保護之行為、不斷的騷擾、遷怒施暴於子女及他人、日益嚴重的暴行（伴隨暴力而來的破壞毀損傢俱、放火行為）等，此均為高度危險的指標，應立即尋求協助與約制。當然，若有其他家人同住，可能對於親密伴侶的暴力能夠有較佳的約制，但亦不可輕忽有時加害人的權控暴力亦有可能及於其他家人。因此，認識易生暴力的危機，避免誘發暴力的發生，同時協請其他家人的協助，是有效避免暴力的因素。

(三) 社區的生活空間

社區意識是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的新興話題，潛在被害人積極地參與社區活動，與其他社區成員有所互動，可以有效減低親密

暴力的危險情況。人與人之間人際關係的疏離，常是造成犯罪問題嚴重的主因。（C. R. Jeffery，1983，轉引自楊士隆、蔡德輝，2012；許春金，2006）處理家庭暴力實務工作中發現，家庭暴力的「權控」因素，對缺乏人際聯結的被害人而言，更是一項危險的警訊。切斷被害人一切對外聯結的予以絕對的權控，是加害人所最期待的情況。被害人在無人際連結的情況中，遭受暴力更是不知如何求助。因此，人際關係彼此連結，可提供在親密暴力中易為受害一方，有較多的諮詢與支持。同時，連結緊密的社區對於家庭內的暴力行為，亦較容易協助通報相關單位，增加介入服務的機會。因此，個人應主動關心生活周遭的事務，善盡公民社會的本分，為親密暴力受暴者，提供即時的協助。

經由研究發現，部分親密暴力加害人予以法律約束可以有效降低暴力，因此當社區民眾具備通報意識後，法律約束與執法效能的支持更可強化親密暴力的遏制。因此警政單位在保護令的執行與約制查訪可多加著墨，甚至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在緊急逮捕拘提等執法手段的運用，均可成為安全社區的重要支持。

同時目前社區發展意識增加，部分社區亦有巡守隊的設置。社區巡守隊的成員大部分為男性居民。若能對於社區巡守隊員以防治家暴議題的協勤方式為前提，進行教育訓練，甚至邀請巡守隊員眷屬一同參加，討論家暴防治議題。如此除能提升巡守隊員在發現親密暴力案件能即時提供協助的能力之外，更能對於巡守隊員與眷屬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正向親密暴力防治的認知，進而成

為暴力防治尖兵與種子師資，補足現行法律在「社區宣導教育」的不足。

二、生活安全空間管理與敏感度

除了前項對於個人、家庭與社區生活安全空間的建構之外，每個人亦應將生活場域區分為三種安全等級；包含對於個人安全無虞，可自在生活的「安全空間」、對於危機可能出現顧慮，應行提高警覺的「顧慮空間」、以及危險侵害行為可能出現的「危險空間」。同時並針對這三級安全空間，隨時保持高度敏銳。更重要的是，空間的概念更應結合環境及人、事、時、地、物的因素，整體考量，採取必要的行為模式加以因應。同時應認知，「安全」並非不變的因素，「安全」狀況會隨著時空環境的相關組成因素有所變動。對於安全的敏銳感，無論在家庭內與家庭外都應同等重視。

處於「安全空間」時，個人自可安適生活。但若二人互動緊張，情緒緊繃，有前所提及之危險狀況增加，如男友開始使用酒精、情緒精神障礙無意就醫、或進入談判分手或離婚中之狀況、開始有不理性之跟蹤騷擾行為…等情況。此時，「安全空間」立即提高危險成為「顧慮空間」，因應的對策是全力排除危險因子，如暫時分開、減少提供酒精使用、接受治療、強化本身安全管理能力，尋求協助與支持，致力使危險程度降低，並提高警覺。而在「顧慮空間」時若加害人開始顯有危及生命、身體安全的行為出現，例如情緒持續緊繃、精神嚴重失控，預備犯罪、暴力行為可能隨時出現等情形，此時便已處於「危險空間」，因應的對策便是立即

脫離該等時空環境，以確保本身的人身安全。空間的危險程度愈高，被害的機率愈高。在整體親密暴力防治的作為中，自保，是最為基礎的部分。若能增強自我安全空間管理能力，事前避免使自己陷入危險的空間期間過長，這是最佳的預防策略。

三、生活場域監控作為的強化

除了對於空間危險的敏感，監控作為亦是極為重要的一環，監控作為在親密暴力案件中可有以下幾個部分：承諾與共識及自我安全、緊急求助設備與他人監控及法律監督等：

- (一) 承諾與共識是指親密伴侶二人間對於愛與尊重的共同承諾，有愛與尊重的家庭沒有暴力，這是二人對於共同生活的承諾。因此在兩人準備共同生活時，對於意見不同的調解方式即應形成共識，並且承諾不使用暴力，同時亦應提及暴力出現時之處置，意即最低底限的告知。如此在生活過程中，能有效避免暴力出現。自我安全則是前是提及對於安全空間的管理與敏感。
- (二) 緊急求助設備則是近年來保全公司發展的科技設備。此一科技設備可結合衛星定位與緊急求助電話的即時撥話。在親密暴力發生之時，若能緊急發出訊號，該設備可撥打電話示警，並可設定撥出之號碼，如 110 警察報案電話、保全公司及自行設定之門號。回撥予保全公司時，該設備並同步傳送衛星定位之位置，提供救援人員即時情資。
- (三) 除了科技設備的監控以外，人的監控能力亦極為重要。人的監控能力區分為他

人監控與自我監控。他人監控包括空間管理者、使用者及公間整體使用成員…等。管理者對於友善安全空間的建構、活動與顧慮場所的檢查、巡視，或者其他成員對於事件中二人的協助監控作為等；如社區保安全管理員、鄰居、家人親友等協助，這些均屬於來自第三人的監控。自我監控則是在個人親密暴力議題的自我覺察與回應，包含前所提及的各項危機因子一旦出現，都有可能發生更進一步的暴力行為。因此自我監控的範圍包括敏銳的情境識別、有效的安全管理、預擬的脅迫回應、嚇阻的反擊能量…等。惟有在風險空間中能夠有所警覺，方能即時採取策略避免使自己陷入危險空間中。

- (四) 法律的規範是遏止親密暴力發生的最後手段。有效的執法與對於暴力的即時約制，也是犯罪預防的一種方式。目前我國對於親密暴力的法律規範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經由落實執法與全面的法令宣導，亦可為監控方式的一種。

📖 參考文獻

- 王珮玲（2009）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實務操作方法的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1），141-184。
- 王樂民（2011）婚姻暴力加害人施暴原因、類型與防治效能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頁 [http://dspc.moi.gov.tw/ct.asp](http://dspc.moi.gov.tw/ct.asp?ctNode=1&ctid=1&cid=1&ctKey=1&ctValue=1&ctAction=visit)
visitation: September 2012
- 邱獻輝（2012）探究男性親密暴力之文化意涵。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8（1），27-50。
- 沈慶鴻、郭豐榮（2005）強制戒癮家暴加害人飲酒經驗、戒癮態度及暴力行為之研究。中華心

伍、結語

親密暴力問題防治極具挑戰，因事件發生之彼此二人內在關聯因素多樣，生活互動緊密性極高，防治介入有其困難。個人自我保護能量與對覺察危險的能力是安全基礎。本文從個人、家庭及社區安全場域的架構提出防治作為說明，並就空間管理提出三種危險等級之概念，然更應體認「安全空間」是一項隨時變動中的議題，是以空間概念務必再加上人、事、時、地、物等動態因素的結合及綜合判斷，以為因應。唯有提升自我安全管理，強化危險情境識別能力，避免危險刺激因子誘發，並預擬應對處置腹案。如此才能避免使自己在親密關係中陷入危險情境，增加受害機率，在親密二人間的人際互動，得到愛、尊重、平等與安全。

（本文作者現職雲林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組長。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關鍵詞：親密暴力、安全空間、高危機個案
網絡會議

- 理衛生期刊，18（4），31-53。
- 林明傑、沈勝昂（2003）我國婚姻暴力加害人之危險評估：DA 量表在我國適用之研究。犯罪學期刊，6（2），177-216。
- 許春金（2006）犯罪學。臺北，三民。
- 蔡德輝、楊士隆（2012）犯罪學。臺北，五南。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ies. NY: Springer.
- Busch A. L. & Rosenberg M. S. (2004), Comparing Women and Men Arrested for Domestic Violence: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Vol. 19, (1) 211-215
- Maslow, A.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2-396
- Sigel, L. J. (2009) Criminology (10th ed) NY: Thomson & Wadsworth.